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董德福

内容提要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新孔学 儒学复兴 新文化运动 传统 现代

1917 年,梁漱溟(1893—1988)受聘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云集了一大批在日后思想界叱咤风云宣传新文化的中坚人物。在"西化"业已成为时尚的文化氛围中,梁漱溟特立独行,以批评西化思潮为职志,怀着弘扬发挥东方文化的宏愿,顶住巨大的精神压力,潜心于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四年后便发表了"归宗儒家"的"震古烁今之著作"(蒋百里赞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因此饮誉京华,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系统论述东西文化和东西哲学的经典之作。是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梁漱溟检讨审察"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后所作的总结性宣言。他以比较哲学的手法,论衡西洋、中国、印度三系文化之异同优劣,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反思,探寻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历史走向,最后以儒学在现代的复兴为落脚点和归趣。

在人人皆曰奴儒误国、"打倒孔家店"呼声盈耳的时代里,梁漱溟悍然标举孔家义旗,以"新孔学"相标榜,与反传统主义者相抗衡。其逆反新潮、掉背孤行的胆识,鲜有出其右者。由于他所讨论的东西文化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人人心中的问题,且所持东方文化优胜的见解圆融高明、多抒新意,遂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他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比之先前的守旧腐儒无疑要高出一筹,对新派的欧化模式更是当头棒喝,是化解传统与现代、价值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努力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尝试。影响所至,不仅泛及华夏、显于当时,且超出国界、绵延至今。"新孔学"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 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已再版了八次,影响之巨怕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堪与之比肩。该书一出,赞誉附和者有之,同情批评者有之,激烈反对者也有之。友人李石岑在论评该书时曾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行不到一年,已经得了近百篇的论文,十几册的小册子,和他大打其笔墨官司。这样一闹,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的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①]。"新孔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效应由此可见一斑,梁也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二十年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②]之一。

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传统儒家价值体系大厦将倾之际,"新孔学"能赢得举国性声誉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认为,梁氏理论在二十年代具有如此魅力,"说明了在沿海大埠的学术圈外,新文化运动的震憾是有限的"[③]。它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化遭

遇西洋文化的冲击而很快败下阵来，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冥顽不化的守旧冬烘的无能。这些人虽执持着护卫传统，对抗西化的原则，却缺乏灵活高明的战略战术眼光和应变手段。梁漱溟痛切地指出，当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步步进逼，直向咽喉处下刀时，旧派仍只知搬弄些"死板板烂货"，说它们是如何如何的好，对西方文化之优长不愿承认，或干脆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且不加区分地为传统文化延误现代化进程开脱罪责。这如何经得起头脑明晰犀利的陈独秀的反击？如何在历史事实面前站得住脚？又如何在与新思潮的抗衡中重现儒学的光辉？鉴乎此，梁漱溟坚持对中国文化不卑不亢，对西方文化亦迎亦拒的态度，以寻求文化界的同情与理解。他对儒家道德哲学的直觉主义阐释和对真假儒学的严格甄别，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传统中开掘出许多为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资源；他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礼赞和对西方工业文明流弊的揭露，是以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为前提的，不仅包含有学理上的合理性，且有事实上的根据；而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相对尊重和对历史上扭曲了的儒学形态的严厉指斥，表明他所建构的文化哲学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理智的抉择代替了感情的偏执。这一切足以使梁成为保守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而且使保守主义阵营具备了堪与西化派相对垒的声势。西化派和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把梁漱溟看作是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最大障碍、最危险的言敌，关键正在这里。

从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发展脉络看，"新孔学"之能够在现代思想文化界具有其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原因不外以下三端：

一、复兴儒学，抗衡西化

缺乏对东西文化的精详分析和历史的、动态的比较研究，就没有资格对东西文化之优劣、长短以及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妄加臆说；不能超脱皮相而深入其里的简单文化类比，就难免支离、芜杂，不得要领。梁漱溟深晓此理。他将作为成绩品的"文明"归源于"生活样法"的文化，再以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内核来涵盖文化，由"意欲"立论，标出中、西、印三大系文化的究意分野。认为"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④]这就是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梁试图让人们相信，就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言，是由西方而中国而印度，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的变迁，西、中、印三系文化将挨次轮班地演进。中国儒家文化是代表着未来的，在价值形态方面远高于西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本源上有何不足，只是"文化早熟"、"调和"态度拿出得太早，因而不合时宜罢了。换言之，较之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化是过而后不及。时至西方工业文明弊端已显的现时代，走在第二条路上的儒家文化正可纠西学之偏，补西学之缺，不必自轻，放弃固有，模仿西方。他深信，儒学在将来的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更是救西方之自毁的不二法门，中国文化理应对现代人的生活有所贡献。这也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贺麟先生曾指出：梁漱溟"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他的思想可以"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⑤]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则认为，作为现代新人本主义的前驱，"新孔学""开启了保守知识分子后来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许多企盼，如民主可从中国传统'开出'说，'中国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等"。[⑥]通观梁氏文化理论和实践可知，他对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再度辉煌所倾注的热情足以与西化派批判传统、全盘学习西方所作出的努力相提并论，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确有原创性功绩。

梁漱溟之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总代言人，是由其文化理论立论的圆融高明、新儒学思想的深刻创见、对西化派立场的有效设难、以及充满着对现代人生活的人文关切等特点决定的。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重构的三条方针：(1)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2)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3)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⑦]

众所周知，梁漱溟是倾心佛法的。他认为佛教文化高玄妙远，是人类智慧的极至和世界文化的最终归趋。但佛教文化的复兴当在儒家文化复兴以后的较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现在提倡尚不是时候。且印度宗教文化是出世的，不符合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因此，“排斥印度的态度”易得到多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似无需多议。值得注意的倒是以下二层：

其一，梁尽管对西方文化少有好感，对西方功利型人生态度和主客分离的哲学倾向更是批判有加，但对发达于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这两大精神可能给予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贡献，有着深切的认识，表示要无条件的承受，以为实现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之资，这多多少少还是保持了与“五四”时代精神追求的一致性。当然，吸取西学长处，仍须确保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注意防止西学业已给西方社会、西方人的生活带来的弊害，也即对西方文化要“根本改过”。这虽“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然而他却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⑧]，具有了近代的特征。

其二，通过对儒家传统的清理，使“中国原来态度”——原始儒学重放光彩。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儒学一直被视为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梁倾其全力替孔子辨诬，还孔子儒学以本有的神圣灵光，指出唯有孔子儒学才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遗憾的倒是真儒学从未在历史上真正实现过。二千多年来，历经后儒的歪曲篡改，孔子儒学已变得面目全非。为此，梁漱溟牢牢抓住替儒学正本清源这一环节，以唤起人们对儒学的应有尊重。一方面，他对僵死的、形式化的儒学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与新文化将士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了五四人应有的自我批判意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将儒学末流从传统中清除出去的同时，要认真挖掘和充分体认儒学的真精神。他认为以孔子“刚”的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原始儒学——“中体”，含融了中西两大文化的长处却没有他们的短处，且对西学具有统摄作用。可见，正如艾恺所说：“在梁的理论中，‘体’已不再是中国人当时所据有的东西，已成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潜能；‘用’的有效获得取决于‘体’的实现。”[⑨]梁漱溟文化哲学的魅力及其能与西化思潮相颉颃的基点正在于此。虽然参照梁的生活体验及透过他文化重建的三条方针，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内含的矛盾。但不可否认，他的新儒学思想达到了前人不曾有的高度，形成了对西化派真正有力的挑战。五十年代后期，台湾的胡秋原先生仍认为“新孔学”“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这决非虚语。

二、以人文自觉反对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导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系统地比较东西文化的文化哲学著作，与同时期的梁启超泛论文化不同，此书将“五四”时期广泛层面上的文化论战引入了涉及东西文化根本精神的哲学领域，为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形成做了初步的哲学定位，梁也因此获得了“新陆王”哲学家的美誉。他对中国精神文明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划分，意在贬抑西学，弘扬中学精意，影响了爆发于 1923 年的科玄论战，成为中西合璧式玄学人生观的精神导师。

严格地说，中国现代之有系统的文化哲学当自梁漱溟始。梁以独特的方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物质技术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等世界性课题，他所提供的解决途径对后人有导向性影响。尔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在谈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时，很多

人仍然停留在他所规范和描述的框架和问题中。

“新孔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从文化角度突出了西方现代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苦恼、失落等情感方面的问题。梁通过对西方功利型人生的严厉批评，将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凸显了出来，由中西的比较过渡到中国传统的发扬。在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厄运临头的危殆情势下，梁肯定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特别是肯定了孔子儒家学说的生命和智慧，这就确立了现代新儒家学派尊孔崇儒的精神方向。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在谈到梁漱溟对现代新儒学的贡献时曾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顶盛的时候，……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10]。现代新儒家所要接引的源头活水，正是要通过宋明儒学而遥契孔孟先秦儒学，梁漱溟自觉地开启了这一方向，这对后来者是有重要意义的。

“五四”前后，“新青年”派选择了西化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来源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和“功利型”人生主宰了中国思想界，导致日后“科学一层论”的武断和物质利益至上论的泛滥。这是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注重概念分析、肢解整体对象的实证方法，作为一种专注于外在静体的理智认知方法，忽视了对人类生命个体的情感关怀和对形上本体的哲学追求；而极端唯物主义贪图物质享受和利益钻营，疏忽了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体验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把立体人生平面化，把传统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尊严所编织成的动态宇宙，化为实验室中静的观察，重蹈了西洋近代以来“精神陷在物质”里的“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之覆辙。这对本已飘摇欲坠中的儒学传统无疑是雪上加霜，因而引起梁漱溟的深深忧虑和竭力反对。梁认为，“西洋人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以致于“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救治之法是“把适才化为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11]，重返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者在精神不在物质。精神富足，可以补物质匮乏之偏；物质充裕，却难以救精神荒疏之弊。可见，他是一个地道的重精神、轻物质的现代儒者。

当然，“新孔学”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张扬并非完全抹杀科学和物质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事实，而是在确保价值优先、精神优先前提下，试图在科学与价值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谋一“中道”。这一思想对后来新传统主义者的影响是巨大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对“科学万能论”的诘难；唯情哲学的倡导者朱谦之对机械人生的批判和对直觉人生的礼赞；以及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在内的现、当代新儒家对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为学与为道、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区分，无不是沿承了“新孔学”的内在理路。

生活于现代的梁漱溟，力图通过对陆王派人生态度的提倡，解决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意义危机”、“精神迷失”问题，重新找回现代人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虽然用近视的眼光来评判，新孔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方向与“五四”新思潮是背道而驰的，但作为对新文化运动“辩证的反动”，梁独具慧眼。他针对西化派的偏弊所作的反击是有力的，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互补因素，新孔学是“五四”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道德人本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相磨相荡，相斥相融，共同描绘了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绚丽色彩。

三、开启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

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过西学的冲击和“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已景况剥极，杜维明先生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来描绘儒学的窘况。传统儒学若不经过认真的梳理，拯救其合理

的内核，真有从此一蹶不振之虞。梁漱溟以超人的智慧和气度，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并藉此对儒家哲学作全新的解释，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

梁漱溟认定，在西方哲学中，唯有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孔子儒家哲学相遥契。生命哲学蔑视科学理性，裁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能动性。其尚变的特征，与中国儒家刚健精进、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念相契合；主张无内外、无能所之区分的直觉体认的认识进路，与儒家轻知识、弃科学、重体悟的人文传统相仿佛；其关于生命超越物质，以求人类精神自由向上的观点，则与儒家清心寡欲以求精神独立的人格理想相类同。梁漱溟在生命哲学观念的引导下，诠释孔子仁学，建立生命本体、强化直觉体悟功夫、追求健动自主超逸艺术的人生境界，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命。因此，“新孔学”在本质上无宁说是一种以儒家哲学为内容的生命哲学。这一方向，对现代新人文主义的启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2]

梁漱溟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心性之学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结合。受柏格森的影响，梁氏的形而上学理论突出了“生命”的原则。他反对机械论者把宇宙视为一个外在于人，可以为人的理智所把握的静态实体，认为宇宙乃是与人的生活、行为融为一体的生命过程，它处于永不停息的流变过程中。因此，对宇宙本质的把握，舍直觉的进路外别无他途。梁漱溟以直觉解释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王阳明的“良知”，把作为认识方法的直觉，演变为具有实践功能的道德范畴。这样，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俨然成了现代的生命哲学家。梁氏以直觉人生涵盖孔子儒家哲学的全部而忽视其中的知识传统，且以直觉人生与理智（功利）人生的区别标示中西文化的总体分野，是主观武断、六经注我的手法。一方面，他以传统释传统，过分强调中西之异，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其不同于西方文化之特异点，这就难以突破传统樊篱而超越自己，遂其现代化了儒学的宏愿，也不利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共进；可另一方面，他把生命哲学的原则内化到儒家思想中，对儒家哲学作了直觉主义的发挥，有利于凸显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对纠正胡适等人从实证的、知识论的方法和角度评介儒学之偏显然是有意义的。须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换言之，中国文化之特长，不在其知识论传统和逻辑实证的方法，而在于其道德理想主义及对主客浑融不分的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也正是生活于现代的西方人日益看好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

梁漱溟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直觉法，“从柏氏那里为中国哲学找到了一种解释，在研究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面毕竟可以看作一种新方法的引入，这种引入在方法论意义上并不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差”[13]。梁漱溟建立“新孔学”所凭藉的这种“新方法”，对后来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贺麟先生称梁是民国以来“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并引起他“注意直觉问题”，撰文专论直觉方法。他“由漱溟先生的直觉说，进而追溯到宋明儒的直觉说，且更推广去研究西洋哲学家对于直觉的说法”。区别于梁，贺麟认为“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谓直觉方法与抽象的理智方法不同则可，谓直觉方法为无理性或反理性则不可”，从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看，注重直觉方法的中国哲学与注重理智方法的西方哲学当有互相融合、综贯的必要。[14]不难看出，贺麟对梁漱溟直觉说的修正，表达了他对中西哲学互补的愿望。比之于梁，四十年代的新儒家以更加开放、更具自信的心态对待西学，因而包含有更多的合理性。区别于贺，一代儒学宗师熊十力在挚友梁漱溟的直接影响下，援生命哲学入儒，区别直觉与理智、性智与量智、玄学与科学，以“体用不二”立宗，创建了“新唯识论”哲学体系，阐发中学精义，批判西化谬谈，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颗奇葩。作为学生辈的牟宗三、唐君毅则从

"新孔学"中获得精神食粮和复兴儒学的门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熊十力的仁心本体论以及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的糅合，建立了现代新儒家中体系最恢宏、气势最磅礴的中西合璧式哲学。

在论及"新孔学"对现代中国哲学产生影响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生朱谦之(1899—1972)于二十年代倡导的"唯情哲学"。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目标旨趣上，"唯情哲学"均与新孔学相一致。朱谦之曾多次提及与梁的师友关系，两人曾相约为小孩子般的朋友。他承认自己的思想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甚大。朱氏唯情哲学以生命哲学比附孔子仁学，高扬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真实，主张以直觉代替理智，着眼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与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相颉颃。他对真情生活妙景的描绘，几乎是梁氏直觉人生的翻版。⑮

"新孔学"形成于二十年代初年，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西化思潮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发出来的，是被动的文化反省和文化"应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工业国的崛起和大中华经济圈的逐步形成，绵延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已不再像本世纪初那样成为众矢之的，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助力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所认识。现在是经过科学文化洗礼的儒家文化向西方文化主动发起"挑战"的时候了。只有置身于世界经济和世界文化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观察，才能对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给予恰当的评价和预测。必须看到，在中国人面临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的"五四"时代，梁漱溟复兴儒学的价值导向，难免有"情绪化偏执"之嫌。但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性批判和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则的坚决维护，以及困扰着他终生的"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时至今日仍发人深思、启人心智。新孔学把民族生命与历史文化等同起来，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吸收、改造、同化西方的近代思想，谋求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现实出路，虽不能说成功，但也算不得保守，与"向后看"的复古派有本质区别。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尚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注意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所走道路的某些明显失误，使发展的途径和目标带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那么，梁漱溟对中国亦或是世界20世纪乃至更远将来历史的影响和意义才是深远的。梁本人晚年重登讲坛抒发旧说，且备受注目，要即在此。

注：①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92年《民铎》三卷三号。

②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太平洋》第4卷第1号，1924年3月5日。在吴稚晖看来，除梁漱溟外，二十年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还有梁启超、朱谦之、胡适三人。

③《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92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

④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三章。

⑤⑧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9-11、12页。

⑥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期。

⑦⑪《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505页。

⑨艾恺：《梁漱溟传》，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⑩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112页。

⑫⑮参见拙作：《现代新儒家与柏格森生命哲学》，《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朱谦之生命哲学初探》，《福建论坛》1993年第4期。

⑬王宗昱：《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4期。

⑭贺麟：《宋儒的思想方法》，《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作者　江苏理工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真漫亚）